

◀（上接 6 版）

洽,还帮助和培养了很多中国本土地质学家,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袁复礼。袁氏跟随安特生在仰韶渑池、甘肃进行考古发掘,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安氏也有很大关系。

安特生热爱中国,在很多场合下都会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如安得思曾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发表文章贬低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丁文江在与步达生、安特生聚会时对此表达了不满,安氏便在给美方的信件中提及了此事,后来美国方面对此进行了道歉。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抗战时期他还从道义上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安特生文笔优美,擅长叙事,他的代表作《黄土地的儿女》一书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展现出来。

安特生去世后,其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的继任者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发表了回忆文章,称安特生是“地质学和地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以及中国考古学划时代的先驱”。在谈到安特生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时,他认为“安特生在这项事业中的显著成功,一方面归因于他作为地质学家的技能和经验。作为地质学家,他能够将地形作为一本开放的书来阅读,并且识别史前定居地的可能地点”。安特生能用地质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考古学地层方面的知识,是他成为考古学家的重要因素。

安特生的经历给我们以诸多启迪。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他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住各种线索,充分协调利用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了从地质学家到化石收集者,再到考古学家的身份转换。他与丁文江等人一起,与各国学者及机构进行广泛合作,促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地质学科迅速实现国际化,打开了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从地质调查所建立到抗战爆发的短短20余年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乌普萨拉大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法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等机构在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各国学者之间既有合作,亦有竞争,共同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使之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学科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相信也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为节选,注释从略。全文见《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即出)

宋史学家王曾瑜：

岳飞并不“愚忠”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岳飞之孙岳珂只能曲笔写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为后世戏曲小说塑造岳飞的“愚忠”形象开了先河。但人们不能苛求岳飞超越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是祖国至上。

岳飞“愚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文汇报：对很多读者来说,很难将您修订刚刚出版的《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下简称“《校注》”)与岳飞联系起来,请问“鄂国金佗”四个字与岳家有何关联?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28卷和《鄂国金佗续编》30卷,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是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

“鄂国”一词源于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这是古代的封号,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比较凑巧的是,岳飞当年的屯兵之地就是现在的武汉,就是在“鄂”,这挺有意思。“金佗”是嘉兴府城内的坊名,岳珂曾在金佗坊中居住。“鄂国金佗”实际上就是“鄂王”的意思,取“先王佩佗绶于鄂”之意。宋末董嗣杲诗说:“何处有花春掠眼,金佗坊里岳家园。”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我发现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学生经常会把这两部书的书名写错,这是很不应该的。特别是把“佗”误作“陀”,把“粹”写作“粹”。“粹”或与“萃”字相通,是几部分合编,即萃聚的意思,这与“纯粹”的“粹”完全是两个意思。

文汇报：在各朝各代的史书中,岳飞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王曾瑜：现在我们都知 道,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当时祖国的进步和统一奋斗不息,最后却惨遭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屠杀。

但在岳飞死后的20年间,他被当时的朝廷塑造成了一个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人。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大量有关岳飞的文字资料佚失或被销毁。在三令五申禁绝私史的同时,秦桧的养子秦熈

主编了《高宗日历》,恣意篡改官史。当时一个“日历之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你想,岳飞生前居高位、握重兵之时,秦桧已如此放肆,那么秦熈在日历中如何诋毁岳飞、磨灭岳家军的战绩,更可想见。

《高宗日历》等宋朝官史今已失传,现存记述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史籍,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两部书号称良史,但关于岳飞的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讹百出,甚至还转抄了宋高宗和秦桧之流的不少污蔑之词。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绍兴七年(1137)岳飞突然提出辞呈,与宋廷发生冲突,其中原委秦熈的日历讳莫如深,并作了精心的篡改。徐梦莘和李心传也沿讹袭谬。但在《鄂国金佗粹编》中,我们看到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出尔反尔,使岳飞愤而辞职。再比如,在宋朝官史中,没有岳家军绍兴十年(1140)大举北伐并取得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捷的记录。故宋孝宗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是些不足道的小胜。而《鄂国金佗粹编》公布了当时的一份奖谕诏,说在“十五年”中,“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这是在岳飞生前,宋廷对郾城之战作出的绝高评价。还比如,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承袭了秦桧之流的毁谤,说岳飞有意逗留,拒不赴援。岳珂依据宋高宗的亲笔御札,推翻了对祖父的污蔑不实之词。如此等类,不胜枚举。

文汇报：后来岳飞形象又是如何得到扭转的?

王曾瑜：这主要是在岳飞的冤案被宋孝宗平反之后。说



王曾瑜 1939 年生于上海,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邓广铭先生。王曾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有《岳飞新传——尽忠报国》《宋高宗传——荒淫无道》《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军制初探》《辽金军制》等。

到平反也很让人唏嘘,岳飞死后近40年,宋孝宗决定给他定谥号,但“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攷质”,可见岳飞事迹被湮没到何等地步。为了定谥,官员们不得不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但对岳飞事迹的记述依然颠三倒四,挂一漏十。

平反以后,岳飞的三子岳霖承担了重新整理父亲历史的工作。他搜罗到一部分残存的史料,其中包括80多件在左藏南库“架阁”的宋高宗亲笔御札。他还“攷于闻见,访于遗卒”,并请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一个岳飞传记的草稿。63岁临终之时,他将这份草稿和其他史料托付给了次子岳珂。岳珂当时20岁都不到,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父亲的基础上又收集了很多材料,在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编成了《鄂国金佗粹编》。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岳珂又将有关祖父的其他文件和记载彙编为《鄂国金佗续编》。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恣意玷污青史之余,岳霖父子穷搜冥索,得到了不少原

始文件和其他记载,据以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

文汇报：考虑到《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是岳家后人编写的,而且写作时仍是宋朝,您认为这两本书中对岳飞的记录是否真实可信呢?

王曾瑜：总的来看,这两部书无疑是成功之作,但也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和疏漏。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岳珂只能曲笔写作,却为后世戏曲小说塑造岳飞的“愚忠”形象开了先河。这主要表现在隐去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回避了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当然,这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岳飞既然是在赵宋政权之下恢复名誉的,岳珂就只能表白祖父“独以孤忠,结知明主”,“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事实上,岳飞与皇帝的矛盾,在绍兴七年(1137)前即已存在,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宋高宗最器重、最着力提拔的武将。自绍兴七年宋高宗收回令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之后,两人的裂痕愈来愈深,直至最后宋高宗决心违背宋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动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岳珂不愿也无法正视这个客观的史实,只能煞费苦心铺叙了许多曲笔,大谈宋高宗如何恩遇岳飞,把岳飞蒙难全怪罪到秦桧头上。

“岳母刺字”系讹传

文汇报：我们很多人提到岳飞,都会联想到“精忠报国”四个字,也就是“岳母刺字”的故事,请问历史上确有其事吗?

王曾瑜：“岳母刺字”是在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

(下转 8 版) ➡